

北京： 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 (1400—1900)

上册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美] 韩书瑞 (Susan Naquin) / 著

孔祥文 / 译

孙 昉 / 审校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 (1400—1900) 上册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美] 韩书瑞 (Susan Naquin) / 著

孔祥文 / 译

孙 昉 / 审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主 任：戴 逸

执行主任：马大正 崔建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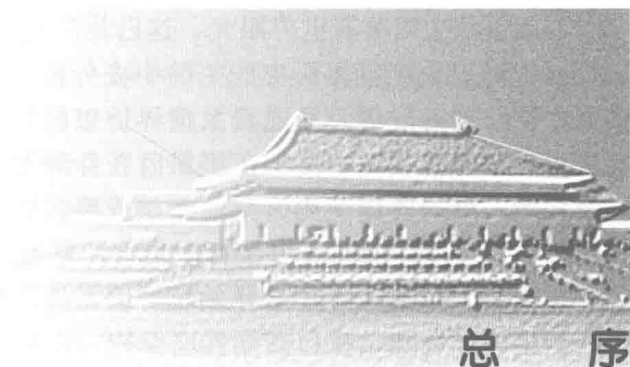
委 员：卜 键 朱诚如 成崇德
郭成康 潘振平 徐兆仁
邹爱莲

学术秘书：赫晓琳 李 岚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Susan Naqu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 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 and 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

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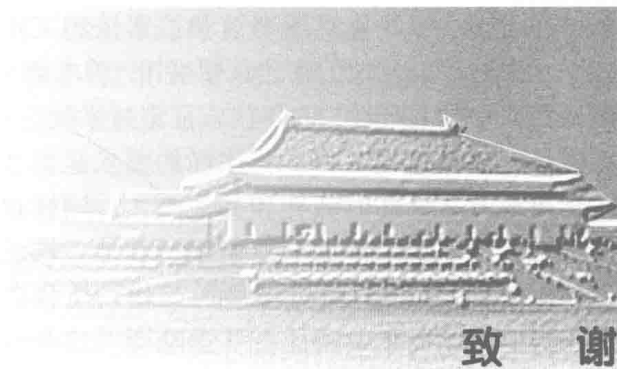
于 沛

2004年5月

本书属菲利普·E.利连索尔书系

本书系是为了纪念菲利普·E.利连索尔 (Philip E. Lilienthal)，他从 1954 年至 1979 年供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本书系专门面向亚洲研究领域的年轻作者，出版优秀的著作。朋友、家人、作者、基金会共同捐赠了利连索尔基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得以借此书系，精选作品，以反映这位了不起而受人爱戴的创造者的品位和睿见。

谨以此书献给希尔达·芒福德 (Hilda Mumford) 和
贝蒂·史密斯 (Betty Smith)，是他们教我爱好历史。



致 谢

1986年，我首次认真地对北京的历史展开研究。当时，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我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两个机构的助学金，并且1986年12月受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会议上一篇论文的启发和鼓励，把我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北京的历史。1987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赞助使我在中国台湾和日本的研究成为可能。我还得到了美国的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的赞助，得以于1987年和1988年在北京开展研究。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支持，我在1991—1992年获得了宝贵关键的一年假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作为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一名成员度过了八个月的光阴。宾夕法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和普林斯顿大学（the Princeton University）也为我提供了假期和支持。对于这些机构的感激之情，我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正是这些机构的支持，使我研究、写作和到东亚旅行成为可能。



在中国，那些重要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冀亚平、郑培珍以及他们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金石拓片室的同人真诚地为我提供 20 世纪 80 年代末征集过来的石碑拓片。当时他们正在进行搬迁新馆的工作，我这样的要求显然成为一种负担。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的韩朴和其他同人，同样也表现出乐于助人的精神。在古老的国子监（即馆藏所在地，堆满了从寂寥院落里搬运而来的成摞拓片）阅览室里的工作，使我在研究中享受到很大的乐趣。虽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现在被称作老北京图书馆的地方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那里的图书馆馆员同样非常热情。在华盛顿特区，我与陈家仁（Lily Kecskes）和菲尔图书馆（the Freer Library）打交道，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居蜜（Mi Chu Wiens）和普林斯顿杰斯特图书馆（the Gest Library）的马丁·海德拉（Martin Heijdra）、牧野靖子（Yasuko Makino）也不辞辛劳地为我提供帮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学生克里斯蒂娜·塔古帕（Christina Tagupa）、格雷格·郝尔（Greg Hall）、艾米莉·胡佛（Emily Hoover）和马修·周（Matthew Chou）在地图方面给予我特别重要的帮助。

这些年来，我和许多 1949 年之前生活在北京的人进行过谈话和通信，他们享有北京的记忆、照片和岁月，他们是卜德（Derk）、加利亚·布迪（Galia Bodde）、吴晓玲（Wu Xiaoling）、罗信耀（Luo Xinyao，又名 H. Y. Lowe）和安妮·古德里奇（Anne Goodrich）。

我的研究中最美好的部分或许是 20 世纪 80 年代我花上数小时骑自行车穿越北京城郊。虽然本书中所描述的一些寺院已经得到了恢复并对外开放，但是更多的寺院却被改作他用。我还非常感谢鞠德源（Ju Deyuan）、李世瑜（Li Shiyu）和阎崇年（Yan Chongnian）等和我一起进行这些短程旅行的朋友们。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友善和有学问的伙伴，而且也是他们帮助我轻轻推开曾经被关闭的一扇扇大门。即使处于被毁坏的情况下，这些寺院也允

* 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本书中凡*注均为译者所加。

许我进行测量工作——当时并没有文字的记载，查看它们先前的规模、设置和环境。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变化可能会席卷整个这座城市。

我和于君方 (Chün-fang Yü) 在中国朝圣方面的合作对于这本书写作的完成产生了影响。对于中国内外朝圣的理解以及我们在会议上的讨论，都促使和激励我撰写一本书，以便全面描述北京。对于她和全部其他人的参与，那些阅读和评论我那部著作的朋友，以及为我提供资助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联合委员会 (the Joint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d the NEH)，我表示由衷的谢意。

在华盛顿特区的时光，使我得以有机会与中国艺术历史领域的学者们会面和谈话，并且把我的注意力转向反映北京的绘画作品上。自从那时起，柯律格 (Craig Clunas)、姜菲德 (Freda Murck) 和简·斯图尔特 (Jan Stuart) 对于我所关注的相关资料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当我于 1990 年开始写作的时候，对北京历史感兴趣的新一代研究生开始涌现。我非常高兴能读到这些论文，听到对论文的介绍，或与马德琳·董 (Madeline Dong)、白思奇 (Richard Belsky) 和陆康 (Luca Gabbiani) 进行谈话；他们正在进行着的和将要进行的工作有助于充实我的纲要（特别是 19 世纪后期）。李中清 (James Lee) 和康文林 (Cameron Campbell) 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在北京人口学方面的成果。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和牛津大学 (the Oxford of University) 提供的评论意见对我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卜正民 (Timothy Brook)、柯律格、柯娇燕 (Pamela Crossley)、崔艾莉 (Alison Dray-Novey)、欧立德 (Mark Elliott)、耿德华 (Edward Gunn)、马丁·海德拉、姜士彬 (David Johnson)、李明珠 (Lillian Li)、刘怡玮 (Cary Liu)、彭慕兰 (Kenneth Pommeranz)、罗友枝 (Evelyn Rawski)、罗威廉 (William Rowe)、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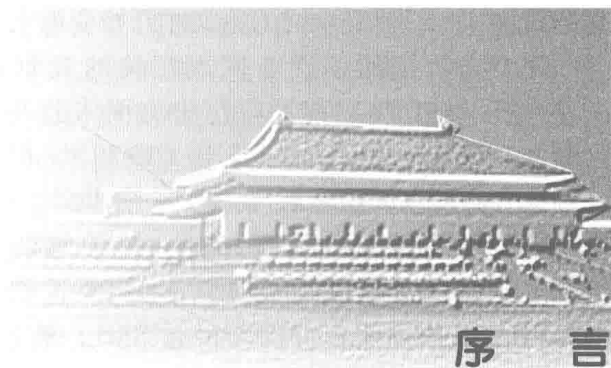
大卫 (David Strand)、弗拉基米尔·乌斯本斯基 (Vladimir Uspensky)、于君方曾经阅读并评论了这本书的部分手稿,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和建议(都是我没有留意到的)。我还要感谢希拉·列文斯 (Sheila Levine)、苏珊娜·诺特 (Suzanne Knott) 和加州大学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的卡洛琳·希尔 (Carolyn Hill),正是这些众多朋友的长久关心使我的写作得以顺利进行。

北京的历史是一个丰富的主题,本书的篇幅既过长而又不够长。对于那些想从中获得更多或者想简略了解的读者而言,我只能表示遗憾。对于那些对这座城市的了解比我更多、更深入的读者来说,我希望他们在这里发现的北京既是令人心安的、熟悉的,又是有趣不同的。

韩书瑞

于普林斯顿

1999年8月



十多年前，当我开始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想把对中国民间宗教和我所熟悉的华北地区的研究兴趣从教派传统中分离出来^{*}，转到更为普通的信仰和活动上面，并决定把主题确定为北京的寺院，仅仅因为我的一个朦胧想法，而我却没有意识到工作量会如此之大。中国的档案是传统意义上的原始资料整理，并非综合性叙述，这是不断形成更多新成果的一种途径，强调北京皇家的过往历史是以损害当地社会历史为代价的。其结果导致了一个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历史没有存在于任何语言之中。^① xix

^{*} 韩书瑞曾长期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和秘密宗教的研究，著述甚丰，其中《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均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

^① 参见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第七章；阎崇年：《故都北京》。最新的研究成果开始改善这种状况。1994年出版的全十卷《北京通史》在方法上是相当传统的。由李宝臣和吴建雍撰写的《北京城市生活史》中有关明清的章节比较好一些，该著作晚至1997年才问世。由于我读到这些著作时，我对相同资料的基础研究工作已经完成，所以我没有依靠这些著作。（译者按：《北京城市生活史》系吴建雍、王岗、姜纬堂、袁熹等著，由开明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作者所说的该书关于明清的章节，即由李宝臣执笔的第三章“明代北京城市生活”和由吴建雍执笔的第四章“清前期北京生活”。）



直到最近，专门研究中国的论文才开始变得丰富起来。^②

用英文阅读的读者会发现相关的文章还是很少的。曾有一些关于 1900 年以前北京历史方面未公开问世的著作，特别是盖杰民 (James Geiss) 博士 (1979)、崔艾莉 (Alison Dray-Novey, 1981) 以及乔安妮·维克兰 (Joanne Wakeland, 1982) 的论文。史大卫 (1989) 关于北京 20 世纪 20 年代政治和生活的著作是我所能见到有关 20 世纪城市研究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史明正 (Mingzheng Shi)、董乐民 (Madeleine Yue Dong)、白恩奇 (Richard Belsky) 和索菲亚·李 (Sophia Lee) 在近期撰写的论文以及其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有关中国其他城市的学术研究虽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但鲜有涉及社会或宗教历史方面。芮沃寿 (Arthur Wright) 和牟复礼 (F. W. Mote) 开创了用英文书写中国帝都历史的先河。二十年前，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提出了一个有影响的分析架构，即比较城市和它们在城市网络 (urban networks) 中的位置，在 1800 年前，大多数中国城市与它们在欧洲的对手 (如果不是日本的话) 相比，显得相形见绌，但是它们仍然保持着替补的角色。幸运的是，罗威廉 (William Rowe) 在两本关于近代早期汉口的著作中所做的分析表明：宏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使得一座城市在 18、19 世纪必须探索城市事务的管理，制订城市社区的发展规划。其他用多种语言所进行的城市研究，包括中国台湾的鹿港，帝国中心的扬州、苏州和上海，以及北方的济南和天津，都有助于为理解近代之前中国城

② 这类论文仍然集中于这些主题：市场、交易、节日、宫殿和景点。参见《北京史苑》第 1~3 辑、孙健编的《北京古代经济史》、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珍贵的历史地图。邱仲麟概述了明代的寺院建筑。[邱仲麟：《明代北京都市生活与治安的转变》，载《九州学刊》(香港)，第 5 卷第 2 期 (1992 年)，77~90 页]

市打下知识基础。^③大量有关 20 世纪城市生活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受学界欢迎，但对 20 世纪之前的研究至今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④

欧洲、日本和北美的历史学者已经提供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有关众多城市中心丰富的描述，但是与我们所了解的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相比，有关中国城市的原始资料显得相对缺乏，其二手资料也是不完整的。尽管这对于那些希望本书能够提供新的有关比较城市发展跨文化理论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失望，但我希望至少能把北京加入城市区域研究的目录之中。这些城市区域漫长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⑤

^③ 扬州，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清时的盛衰：扬州及其内地，1644—1810》；安东篱：《清代扬州的中心地位》，见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苏州，张琳德：《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城市变化的经济形态研究》；马默（Michael Marmé）：《从弱到强：苏州，1368—1550》；马默：《地球上的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见张琳德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桑保罗（Paolo Santangelo）：《中华帝国晚期的苏州城市社会》，见张琳德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曹志涟（Jr-lien Tsao）：《忆苏州：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生活》。

上海，张琳德：《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岸，1074—1858》。

鹿港，戴德安（Donald DeGlopper）：《鹿港：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区》。

济南，鲍德威（David D. Buck）：《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 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

天津，贺萧（Gail Hershatter）：《天津的工人，1900—1949》；关文彬（Man Bun Kwan）：《天津的商人世界：一座中国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罗芙芸（Ruth Rogaski）：《从保护生命到保卫国家：天津公共卫生的出现，1859—1953》。

通论，施坚雅：《导言》《19 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3~31、211~249、521~522 页；牟复礼（F. W. Mote）：《书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史》，载《明史研究》，第 34 期（1995 年），61~76 页。

^④ 对于这部分文献相关的讨论（似乎是 1996 年），参见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和张利民在安克强和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所编的论文集中的文章。有关超出上海范围的研究，参见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主编：《重构中国城市：现代性与民族认同，1900—1950》。两本杂志报道了最近研究，即《城市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墙和市场：中国城镇历史新闻》（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⑤ 请随意使用我的资料去构建自己的理论。我只是希望将这个描述过程可以应用到某些其他可比较的情况，并且在某种中等水平的复杂程度中是有影响的。